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

SHAQIANLIHUIYIJIUGUOHUI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SHAQIANLIHUIYIJIUGUOHUI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

沙千里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沙千里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1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044 - 8

I. ①沙… II. ①沙… III. 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5) —史料
IV. ①K264.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708 号

责任编辑: 卜伟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插页: 4 页

印 张: 14. 125 字数: 13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

SHAQIANLI HUIYIJIUGUOHUI

CONTENTS 目 录

- 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 1
- 二 七人之狱和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斗争 / 33
- 三 抗日战争中的救国会 / 88
- 四 解放战争中的救国会 / 110

附 录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 125
-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 / 137
-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沈钧儒 章乃器 陶行知 邹韬奋 / 149
- 全救会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 / 164
- 沈钧儒等答辩状（摘录） / 167
- 中国人民救国会政治纲领 / 193
- 沙千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 / 202
- 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 / 205



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一）救国会成立前的抗日救亡运动

救国会成立前，全国千百万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已经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甲午战争和“二十一条”就是例证。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放慢了吞并中国的步骤，然而其野心并没有死。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摆脱这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方面在国内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实行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对外加紧侵略，挑起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兵侵略我国东北，

开始了独霸中国的战争。蒋介石醉心于“剿共”内战，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退出东北，致使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丧。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发展。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多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二十六日，上海各界十万余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也先后纷纷罢工、罢课、罢市、组织示威游行和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要求一致抗日。城镇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开展了抵制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的运动，出现了抵制和检查日货的高潮。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济南等城市的大批学生代表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请愿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国民党及其军队中有爱国之心的人士，不断地自动起来要求抗日。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月间，日本军队进攻黑龙江省，当地驻军马占山部奋起抵抗。十二月，奉命在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多人，不满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侵犯上海，企图短时间灭亡中国。驻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违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英勇抗击日军。上海各界群众一齐动员起

来支援前线。上海的日本工厂的工人大罢工，工人和学生组织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许多人英勇牺牲。更多的人担任运输、交通、救护等工作。无数的人捐出自己的存款、日用品支援前方。全国各地人民也都积极支援上海抗战。当时，我作为一个目击者和参加者，深深为十九路军爱国将士以及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抗日热忱所感动。在军队和群众结合下，上海军民排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干扰，坚持抗战一个多月，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其几换主帅，死伤万余，粉碎了其几小时占领上海的计划。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寇在占领热河省会承德之后，向长城各口发动攻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驻守在长城线上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将士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自动奋起抗战。五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爱国人士也参加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来。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国策，恢复中苏邦交，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呼吁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权利。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和全国各地许多爱国人士创办了大量的宣扬抗日救国刊物，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等主办的《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以及沈兹九、杜君慧主办的《妇女生活》，李公朴、柳湜主办的《读书生活》等

报刊，影响全国，是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一九三五年冬，我和徐步创办了《生活知识》，依靠当时许多作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抗日救国运动中也尽了一些摇旗呐喊的责任。

一九三五年五月《新生周刊》刊登易水（艾寒松）所作《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以此借题发挥，胡说此文是有意侮辱他们的“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结果，蒋介石反动政府屈膝降服，将该刊查封，命令法院逮捕了主编杜重远，判处了十四个月徒刑。杜重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给他的“违反敦睦邦交”的罪名，大呼：“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这一事件不仅震动了上海，而且震动了全国，更加深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反蒋激愤。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派间、各界同胞间、各军队间，无论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或意见和利益上的差异，或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我们在上海读到了《八一宣言》的全文，大家相互秘密传递阅读并奔走相告，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从此，我们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八一宣言》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极大

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佩。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得到各地的响应，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成为我们谈话和注目的中心。抗日救亡的报刊更是大声疾呼，支持这一救亡活动。《大众生活》的封面上就刊登了北平学生在天安门前手持话筒宣传抗日的大幅照片。上海大、中学校学生八千多人，连夜游行请愿，对北平学生表示支持。一二·九运动对上海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很大推动，促成了上海和全国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

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文化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对北平学生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指出：“华北教育界‘最后一课’的决心，是值得赞佩的。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

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沈兹九、钱俊瑞、金仲华、潘大逵、周新民等二百八十多人。

这一《宣言》，表达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和主张，受到普遍的欢迎。各界代表都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支持文化界这一《宣言》。这一《宣言》推动了上海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上海各方面救国会的成立，并对上海的救亡运动和救国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从此以后，在广泛深入开展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有纲领、有组织的救国团体。抗日救亡运动以新的面貌在上海及全国出现了。

（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 各地抗日救国组织的建立

我自己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深侵略，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形势下，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自发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的。在参加救国活动的过程中，同地下党的同志有了联系和接触，读到党的刊物和文件，逐渐地接受了党的思想和主张，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并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始阶段，是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斗争也是分散的。虽然在一定的时候为了进行斗争，也有一些串联，但没有固定的形式把大家联系起来。为了某一件事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这种联系也就终止了。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更有力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大

家感到需要一个固定的形式把群众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之下，在千百万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国会先后建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各界群众也建立了各种救国组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妇女界代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这是上海建立较早的救国组织。妇女界救国会的领导机构叫理事会。大会推选上海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十一人为理事。她们曾办过《申报》的妇女副刊、《中国妇女》、《妇女生活》等刊物；有的人还深入到工厂，帮助上海纱厂女工办了《小姊妹》等刊物，秘密宣传抗日。这些活动为推动妇女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为妇女界救国会的成立准备了一个较好的群众基础。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之后，近千名妇女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四川路出发，浩浩荡荡，穿过南京路，至日升楼向南转到东新桥，到达老西门结束。国民党反动派毫无准备，所以示威队伍没有遇到国民党宪警的阻挠和租界巡捕的干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百多人，其中有许多知名的作家、新闻记者、导演和演员、教授、律师、宗教界人士等，是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的一次盛会。大会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沈兹九、顾名、江问渔、

胡愈之、谢天逸、夏丏尊、金仲华、欧阳予倩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大会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因为我们过去的工作是万分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担我们时代的任务。”这个《宣言》在第一次《宣言》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地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宣言》提出：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八项主张。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马上执行：严惩各地摧残救国运动的负责长官；取消对爱国运动的戒严令；撤废新闻检查制度，开放新闻封锁；释放被捕爱国学生及市民等四点。《宣言》还向全国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五项要求。这些主张和要求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而提出的，是对其卖国政策的尖锐揭露，受到上海和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的一致赞同，也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仇视。

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顾名、沈钧儒、王造时、潘大逵、张定夫、潘震亚、曹聚仁、孙怀仁、吴清友、周新民、汪馥炎等发起成立了大学教授救国会。

与此同时，袁牧之、陈波儿等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陶行知、戴伯韬、刘季平等组织了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此外，还成立了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等。

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成立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会址召开的。“职救”集合了许多方面的人士，如公司、字号、海关、银行、保

险、出版以及教育等职业界的爱国人士，主要是下层职员，大多是爱国青年，也有少数上层人士。当时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综合团体“蚂蚁社”，简称“蚁社”，以及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等单位的社员和学员参加“职救”的人数最多。“职救”的筹备会就是在“蚁社”的社址举行的。

“职救”成立大会上推选出理事会，能回忆到有下面的几个人。

葛师良，中国征信所秘书。现在是香港交通银行副总经理。

杨延修，保泰保险公司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现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任崇高，上海杨树浦临青小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

李少甫，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企业中的会计。

杨经才，当时是一家外国人办的保险公司的经理。

还有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和我。后来，理事会出席的人少了，又补进了周豫康、屠伟等人。

我当时当律师，开一个律师事务所，并与徐步创办《生活知识》杂志，半月刊。我被选为常务理事，分工负责总务部工作。以后，我作为“职救”的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又代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职救”理事会每周开一次会，地点不定，经常开会的地点有葛师良的中国征信所，杨延修的保泰保险公司，海关华员俱乐部，以及我的律师事务所。

理事会下面设有干事会，设组织、宣传、总务几个摊摊。干

事会在宣传群众、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干事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

“职救”的组织比较严密，也比较整齐，全体会员分别组成五个大队：

第一大队：包括“蚁社”、法商电车公司、中国国货公司、生活书店等单位的会员。由袁清伟（袁庶华）领导。他当时是中国国货公司的职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第三局局长。

第二大队：包括沪东地区的“蚁社”成员、沪东区小学教员、上海国际电台职员以及杨树浦司机训练班的学员。负责人是任崇高，他年纪比我还大一些，是“职救”成员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

第三大队：包括量才补习学校，量才图书馆的群众（李公朴任量才补习学校校长和量才图书馆的馆长），领导人是汤寿龄（刘峰），当时他在一家钱庄当职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财贸书记。

第四大队：包括上海银行界职员所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银社”的成员，以及上海市钱庄界的群众。这个大队由张承宗领导。他是一家银行的职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第五大队：包括三友实业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立信会计学校的职工和学员。领导这个大队的有王文清（王纪华）以及顾留馨、杨修范。王纪华是上海海关的职员，编辑海关华员的一种读物，刊名叫《关声》。王解放初曾任上海市财经委员会秘书长。

上述各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干事会的组织干事。

每大队三个中队，每中队三个分队，每分队三个小队，每小队三个人。实际人数比这个多。

“职救”会员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上层知名人士；第二部分是干事，也是“职救”中骨干分子；第三部分是一般会员，是“职救”的实际工作者，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职救”由于它主要是由低级职员和学员组成，党员人数不少，当时我虽然不十分明确谁是党员，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中也能看出来。那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是雍文涛、王翰、顾准同志。这三个同志当时我都没有直接接触。当时同我联系最多的党员是袁庶华、王纪华二同志。

“职救”的救国活动，有它的一些特点，除去有时发表宣言以宣传抗日救国外，特别注意基层活动，以扩大抗日救国队伍和爱国影响，并组织成员积极参加游行示威。“职救”的成员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所组织的历次抗日游行示威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力量。

后来，五个大队逐步改变为按行业分队，像保险、银行、教育等。

这样，到一九三六年一月间，上海各方面的救国会先后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成立。这一天是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各方面救国会的代表和爱国人士在上海总商会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推沈钧儒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推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刘良模、沈体兰、沈兹九、张定夫、潘震亚、顾执中、潘大逵、彭文应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组成执行委

员会，统一领导上海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基本上是每个救国会推选一两个主要负责人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都是以集体为单位参加，没有个人会员。

大会临时决定纪念大会之后举行游行。在游行中，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沈老那时六十三岁了，留着长长的胡须，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使我们十分钦佩。李公朴在会议之前左臂跌伤，那天也捆着绷带参加了大会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商会开出，经过北河南路、宝山路，走到大场。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动参加到队伍中来，有更多的人在大街两旁围观，表示支持。参加游行的有两千多人，是上海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示威游行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商会是在租界内，开会时租界当局派出马队，巡捕要阻止示威游行。经过双方交涉，大会同意在租界内不唱歌、不呼口号、不打出旗帜。租界当局同意示威队伍从北河南路整队走出。游行示威的队伍到宝山路口后，情绪益发激昂，沿途高唱救亡歌曲，高呼爱国反日口号，并向大街两旁的群众进行宣传。游行队伍在江湾大场公祭了淞沪抗战无名烈士墓之后，才结束这次游行。这次活动对救国会的会员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抗日救国的精神，增强了斗争的信心。那时我害着病，仍坚持参加了游行，开始走在队伍的前面，后来体力不支掉队了。这次示威游行也比较顺利，没有受到阻挠和镇压。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掌握救国会的活动情况。

那时候，救国会每次活动，开会也好，示威游行也好，我们都

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救亡曲、大刀进行曲等。唱起这些歌曲我们的精神更振奋、更加激发了抗日热情，使爱国抗日的气氛更浓。这些歌曲在当时起的宣传鼓动作用是很大的。时间已过去几十年，许多事情都淡忘了，但是这些歌曲我却都没有忘记，那高唱这些歌曲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起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华北的北平、天津、华东的南京、济南、青岛、湖北的武汉、西北的西安等地都建立了救国会。华北地区在一九三六年春还建立了华北学生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些抗日救亡团体中以文化教育界及青年学生界的救国团体最为显著，最为活跃。

对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威吓和镇压。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极尽诬蔑恫吓之能事，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是“反对中央”，“颠覆政府”等等。同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这个《治罪法》规定，对爱国运动要“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遇有文字、图画、传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各项犯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于必要时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抗拒等等。这就明确地宣告爱国是有罪的。但是，爱国人民绝不会被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决不能阻止千百万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